

宓子贱的君子之风

吴 驥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 (第三季) 征文

“一桥飞架东西,天堑变通途”,随着瓦埠大桥的开通,省内外各地游客络绎不绝,前来饱赏瓦埠大桥的雄伟壮观,品味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君子故里的古风雅韵。

瓦埠镇又称君子镇,得名来源于孔子的弟子宓子贱。宓子贱(公元前521~445年),名不齐,字子贱,春秋时鲁国人,曾任鲁国单父宰(今山东单县)。

据现有文献记载,“君子”一词最早出现于《尚书·无逸》:“君子所,其无逸”,是对有权位有财产的贵族的称号。而真正奠定君子之学思想体系的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,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对“君子”的论述突破了身份、地位的高贵,增加了道德品质的内涵。在《论语·雍也》中孔子曰: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”“文”指人的外在仪表,“质”指人的内在品格。孔子认为:君子是外在仪容优雅与内在道德完善相统一的人,是仁义礼乐化成的高标准的人。君子既能坐而论道,又能运用实际知识技能而行。子谓子贱:“君子哉若人!鲁无君子者,斯焉取斯?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子曰:“君子哉,蘧伯玉!邦有道则仕,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在孔子看来,弟子中可以称得上君子的只有宓子贱、蘧伯玉两个人。有关宓子贱的事迹,《史记》《新语》《孔子家语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典籍都有记载。

宓子贱居处谦恭,勤学好问,颇懂治国之道。鲁哀公时,他被推举为单父宰。上任前,他先去拜访老师孔子。孔子告诉



宓子贱鸣琴治单父

他:“不要因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相反而拒绝,轻易拒绝就会出现蔽闻塞听;也不要轻易许诺,轻易容易丧失操守。”他又到渔者阳昼那里请教,阳昼以钓鱼比治世:“见到钓饵就咬的是阳桥,这种鱼肉薄味淡;见到鱼饵,若即若离,想吃又不贪吃的是鲂鱼,这种鱼肉厚味美。”这就是“阳桥与鲂”的典故。宓子贱心领神会,铭记于心。

单父是个边地县邑,小人当道,崇尚奢华,百姓穷困,风气很差。宓子贱凭借自己的才智、仁爱之心,以德化人。上任后,他“掣肘进谏”鲁哀公,使得鲁哀公放权让他大显身手。他粗布短衣,步行外出,访贫问苦,吊死扶伤。他散发仓廩粮食,拿出自己本就不多的俸禄,救济贫困的百姓。他白天处理政事,晚上秉烛攻

读。在齐人攻鲁经由单父之际,他宁愿舍弃一茬麦子的收成,也要坚持劳动所得各归其主,防范不劳而获之风。司马迁对此赞许道:“惜梯君子,民之父母。子贱其似之矣!”

宓子贱善用人才,得贤事之。在儒家君子眼中,善于“用人”实际上就是学会“事人”,“事”就是“侍”。宓子贱斥退那些奸诈无行、阿谀奉承的小人,登门拜访那些德高望重之人,并把他们当做父亲一样尊敬,当做老师一样礼遇,结交任用那些有威望的贤能之人,并把他们当做兄长一样尊重、当做朋友一样友善,与他们共商治理单父大计,从而教化百姓懂得孝悌,友善邻里。一时间,兴利除弊,政通人和,孔子不禁赞叹“功乃与尧舜参矣。”

“作乐以平心气,审音以知政教”,作为孔子的学生,宓子贱深谙音乐的修身教化功用。他在单父城南修筑了一座简易的琴台,经常在那里弹琴唱歌。美妙动人的琴声吸引民众纷至沓来,使他们受到音乐的沐浴熏陶。“唯天下至诚则能化”,宓子贱为政三年,德化大成,单父呈现出一派升平繁盛景象:男耕女织,物阜年丰,夜不闭户,民不忍欺,成为鲁国史治的典范。孔子啧啧称赞宓子贱尊君守礼、谨守天命,具孝悌之德,能以仁德服人,可谓君子。

后来,功成名就的宓子贱作为鲁国国君的使者,由鲁使吴,途径瓦埠,就在现在的瓦埠小学所在地设立学馆,广招贤士,传播儒家学说,弘扬君子之道。经年间,一场大病使得他长眠在了这里。一千多年后的北宋,八贤王赵德芳微服私访,来到瓦埠,目睹瓦埠因受惠于宓子贱,民风醇厚,敬贤重义,所以赐名“君子镇”,这就是瓦埠镇称为“君子镇”的来历。

“现代新儒家”冯友兰先生说,孔子一生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做人——做人就要做君子,一部儒家之学就是君子之学。宓子贱就是虔诚学习并忠贞实践儒家君子之学的集大成者。

“一室化雨胜鸣琴,君子原怀契圣心; 却为使吴还卒楚,教人铭记至于今。”两千多年来,宓子贱的君子人格代代赓续,薪火相传,尤其是近现代,造就了瓦埠这方热土许多革命志士仁人,为国为民牺牲奉献。而今,随着瓦埠大桥的建造、江淮运河的开通,必将吸纳更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游览,感悟源远流长的君子文化,使得江淮大地“金瓦埠”这颗明珠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。

这位淮南王最悲情

周 强

中国历史上共存在过20多位淮南王。西晋淮南王司马允是最悲情的淮南王。

司马允,字钦度,晋武帝司马炎之子,其母是后官李夫人。太康十年(289年),18岁的司马允由濮阳王改封淮南王,官任都督扬、江二州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侍中、假节钺。从官衔来看,够得上一个封疆大吏。司马允所都督的江扬二州,扬州州治建业,即今江苏南京市;江州为新置州,州治南昌,即今江西南昌市。晋魏淮南国都寿春,领7县:寿春、成德(今寿县瓦埠湖南)、下蔡(今凤台县)、义城(今怀远县东)、平阿(今怀远县西)、西曲阳(今淮南市东高塘湖边)和合肥。7县中有3座县治设在淮水之北,这就与“淮南”的地域概念有些相悖。司马允封淮南王时,淮南国辖域增至16县,新增县有历阳(今和县)、全椒(今全椒县)、阜陵(今和县西)、钟离(今凤阳县临淮关镇)、谯(今肥东县东)、阴陵(今定远县西北)、当涂(治今怀远县东南马头镇)、东城(今定远县东)、乌江(今和县东北乌江镇)等县。淮南国加上扬江二州,可见其控制区域广大,已经接近西汉初期淮南王英布和刘长时期的淮南国境域。

西晋诸侯王国分大、次、小三等。大国辖民户2万,置上中下三军5000人;次国辖民户1万,置上下二军3000人;小国辖民户5000,置一军1500人。淮南国最初属于小国,司马允的私人武装兵力只有1500人。晋武帝又让诸侯王出任地方都督,这样诸侯王既有地方行政权力,又有数量可观的军队,这就为后来的“八王之乱”埋下了祸根。

淮南王司马允虽未列入八王,但却是八王之乱的肇基人物之一。晋武帝去世,晋惠帝继位,由杨太后父亲杨骏控政。晋惠帝是历史上著名的痴呆皇帝,除吃喝玩乐之外一无所知,但皇后贾南风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悍后。永平元年(291年)三月,贾南风秘密联络淮南王司马允,请他入清,除去杨骏,淮南王不敢答应。贾南风又让楚王司马玮干这事。楚王无所顾忌,当时就联络淮南王司马允、长沙王司马伉进京,以谋反之罪将杨骏及其亲党捕杀。司马允“功”成身退,及时返回淮南封国。随后贾南风又让楚王杀掉拒绝听命的淮南王,接着以擅杀罪名将楚王处死。贾南风一箭三雕,接连清除了三股势力,最终走上前台执政,司马允因为及时回到淮南封国而躲过一劫。

司马允回国后,开始着力经营淮南,他任用的淮南国相刘颂“在官严整,甚有政绩。旧修弓鼓,年用数万人,豪强兼并,孤贫失业,颂使大小戮力,计功受分,百姓歌其平惠”。因为司马允在客观上帮助了贾南风,所以地位也得到提升,他以“淮南奇才剑客”扩大了自己的私人武装。长子司马郁封秦王,次子司马迪封汉王。父子三人同为王爷,这在西晋宗室中实为罕见。

晋惠帝元康九年(299年),淮南王司马允开始“入朝”参政。同时辅政的赵王司马伦、贾南风无子,谢淑媛朝后,贾南风诬陷太子谋反,将其储位废黜,囚禁在洛阳附近的皇家监狱金墉城。司马允初入京师,颇有人望,大家一致要求拥立司马允为皇太子。因为司马允曾帮助自己除掉政敌,所以贾南风也将皇储之位愿意于司马允,但是赵王司马伦却将司马允的这

次机会化为泡影。赵王想出兵废黜贾后,恢复司马懿的太子名号,但其佞臣孙秀极为阴险,他建议先蛊惑贾后除掉太子,然后名正言顺的起兵讨伐贾后,这样才有可能登上权力顶峰。

赵王听从孙秀诡计,派人游说贾南风,劝其赶快杀掉太子,以绝后患。贾后中计,将太子杀害,这就给赵王有了合法的起兵机会,永康元年(300年)四月,赵王起兵讨伐贾后,贾后被赐死。赵王立即拥立故太子之子司马臧为皇太子,司马允的皇储梦断。

赵王是晋惠帝叔祖父,执政以后,还想谋朝篡位。但是司马允“性沈毅,宿卫将士皆敬服之”,在禁军中威望很高。赵王担心司马允成为他篡位道路上的绊脚石,就提升司马允为太尉,想削弱他的兵权。国仇私恨交织一起,司马允也察觉到赵王篡位是迟早的事,决心除掉赵王。于是借口养病,“称疾不拜”,躲在家里蓄积力量。八月,赵王矫诏要搜捕他的僚属。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,司马允即征召部属700余人,冲出府门,直奔宫阙,一路大呼:“赵王造反了,我要出兵讨伐,随从我的人就走。”早就对赵王怀有仇恨的兵将官吏不约而同地加入其中,太子左率陈徽也部署东宫将士,“鼓噪于内”,响应司马允。

司马允本先想攻占皇宫,控制晋惠帝后,再以皇帝的名义处置赵王,但皇宫已被紧闭,只得回攻赵王相府。这场恶斗从早晨延续到午后,赵王部属“死者千余人”,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司马允。就在这时,一面旗帜改变了事件走向。

白虎幡与朱雀幡是西晋军队指挥作战的两种旗帜,白虎幡用来指挥军事进攻,朱雀幡用来解除争斗。晋惠帝不懂两种旗帜的不同用处,中书令陈准建议晋惠帝派人持白虎幡解斗。陈准是陈徽的兄长,陈准就利用晋惠帝的痴呆,令人持白虎幡去支持弟弟支持的人,司马护伏胤接受这个差使。伏胤领着400名军士,持白虎幡和准备填写皇帝诏书的空版去支持司马允,路上遇到赵王之子弟司马虔。司马虔问明情况,急忙将伏胤请到府中,与他商量只要如此如此,保证赵王与之共同富贵。伏胤变计而行,直趋司马允军中,诈言有皇帝诏书帮助淮南王,司马允高兴,跪接诏书,却被伏胤冷不防劈死,还说是皇帝的诏令。司马允部众大惊失色,群龙无首,大家一哄而散,司马允两个儿子和过从较密的数千官员惨遭杀害。

唯一幸免的却是好心帮助司马允,结果却帮了赵王的陈准,因为他没将自己的真实意图告诉伏胤,结果伏胤成功后,赵王将陈准升为太尉、录尚书事。公开支持司马允的陈徽也沾光被提任扬州刺史。司马允功败垂成,被杀时年仅29岁,在淮南王位11年。

永宁元年(301年)正月,也就是司马允举义被害5个月后,赵王逼晋惠帝禅位。两个月后,齐王司马冏联络诸王讨赵,得到长沙王司马乂、成都王司马颖、河间王司马颙的响应。赵王兵败被杀,晋惠帝复位,司马允得到平反,被谥为“忠壮”。根据西汉刘向《谥法解》,“危身奉上曰忠,“壮”通“庄”,“兵甲亟作曰庄”,潞圉克服曰庄,胜敌志强曰庄,死于原野曰庄,屡征杀伐曰庄,武而不遂曰庄”。很显然,司马允之“壮”属于“武而不遂”。由其谥号可知,司马允属于历史上口碑最好,也是最悲情的淮南王。

牛蹄之涔

程晋仑

讲述 淮南成语典故 (第五季) 大型征文

成语“牛蹄之涔”,形容水量极少,也比喻处在不能有所作为的境地,出自《淮南子》一书。其原句多次出现在《淮南子》相关篇章中。如,“夫牛蹄之涔,不能生螾蚘;而蜂房不容鹤卵。”——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“牛蹄之涔,无尺之鲤;块垒之土,无丈之材。”——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。其大意是说,牛蹄踩出来的水塘长不出鱼,蜂巢里容不下天鹅蛋。牛蹄注的积水,长不出一尺长的鲤鱼;不起眼的小土丘上,长不出一丈高的木材。

透过成语典故蕴含的道理和寓意,不难发现其对于当下的我们有很多深刻启示,诸如论证、看问题、做

寿州知州林洙喋血州衙始末

孙友虎

佛寺,撞钟至五更,钟竟不鸣,又何怪也。前此太白近月,太史言南方主将不利,未几,洙死焉。”当时林洙的职务是光禄卿、知寿州。光禄卿,北宋初为三品寄禄官。

“王侍郎”,指王克臣,字子难,王审琦之曾孙,王承衍四子王世融之子,宋神宗朝拜为“工部侍郎”,《苏东坡全集·卷一百六·外制制敕六十七》有《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龙图阁直学士敕》,对克臣的评价颇高。《宋史·王审琦传》后附有其传。克臣任寿州通判,寿州是其曾祖审琦、叔祖承衍先后为官、逝世之地,而今克臣又来到此地。六月六“天贶节”的前夜,“鼓角”卒忽然闯入州衙,刺杀本州军将。

军将在擒获打更军卒之后,仍命令属下披甲执刀站在办公大厅,大小官吏惊吓不已,直眼看着不敢出声。克臣徐徐说:“这不过是打更的想偷东西。”命令军士立即回驻地,并告诫打更的军卒不得胡乱攀引别人。天亮,如常举行天贶节活动。《宋史》本传上说,“是日天贶节,率掾属朝谒如常仪,人赖以安,犹坐贬监潭州税。”比对《文丛杂录》,文中“郡将”应为“郡守”,即林洙,因同为“鼓角”军人作案于夜间及时任通判的被贬,后任“工部侍郎”的履历、姓氏相同,当不是巧合。

鼓角匠的动机,把行凶说成像夜游。宋代魏泰在《东轩笔记》中这样描述事发情形,“林洙少服菅鞋,晚年发热多烦躁,知寿州日,夏夜露卧于堂下,为鼓角匠以铁连攀击杀之。洙擒鼓角匠问所以杀守之情。曰:我何情?但中夕睡中,及大醉,若有人引。见榜楼上铁连攀,遂携之以

行,自谯楼至使宅堂前,盖甚远,而诸门扇如故,莫知何以至也。”江休复《杂志》云:送兵下狱,质问,了不自知。鼓角匠是军匠的一种。鼓角即战鼓和号角,用来发号军令和警报之用。宋代仇远《鼓角》诗云:“五更相次晓,一曲有余清。忽醒山林梦,遥闻鼓角声。背风还迤迤,带月最分明。莫作边城看,长淮久息兵。”鼓角匠行凶杀知州,当属罕见之警醒。

通判的说辞,凶手的口供,疑点重重。魏泰《东轩笔记》载,宰相富弼以林洙家无“正室”,怀疑系“奸吏共谋杀”。参知政事曾公亮持反对意见,认为“若是谋杀,必持锋刃”。张唐英《仁宗君臣政要》云:“上见奏报,警曰:二千石之贵,而一兵杀之,足知其不能防。遂令根究,仍原恤其家。自通判以下,皆被降黜。”

事发时间,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,《宋史·王审琦传》附王克臣传记有“是日天贶节”,没说年份。惟《东轩笔记》记有时任宰相富弼、参知政事曾公亮对案情的辩论。《宋宰辅编年录》载,至和二年(1055)六月,文彦博、富弼并相;嘉祐元年(1056)十二月,曾公亮参知政事;嘉祐三年(1058)六月,富弼、韩琦并相,给事中、参知政事曾公亮加礼部侍郎、枢密使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嘉祐三年二月丁卯条载有“故司农卿林洙”之事。以此为节点,佐证“夏夜”,可推知事发于嘉祐二年六月六日天贶节的前夜。

林洙的仕途,不知起于何时。《江西通志》说林洙以驾部郎中的身份知筠州、抚州。《浙江通志》说林洙嘉祐三年

(1036)任婺州知州时,重建元畅楼,“改为皇楼之玉皇阁,移其匾于八咏门城楼上。”至和元年(1054)九月至次年八月,刘敞在任右正言,知制诰期间撰有《将作监林洙可司农卿》一文,其文云:“自周以来,稷为大官,今吾非废稷不务也,而官益轻,岂履其职者未能勉乎?具官林洙,资禀通裕,临履履洁,擢正卿位,尚宜其事。昔乃先正,实领大衣之任,以迪文考。今年谷未充,边人望哺,尔其勤身敏行,无忝名实,予以劝励助民,庶有赖焉。洙世美,不其多乎!”

林洙,经课考,选任司农卿。考课院,掌磨勘幕职、州县官功过,引对黜陟,一般十月份开始课考,如《皇朝十朝纲要》“淳化三年十月壬午”条载,“命户部侍郎刘敞知制诰撰文的时限推断,任命林洙为司农卿,当在至和元年底。司农卿,北宋前期京朝官本阶官,转少府监,带馆职转光禄卿。林洙到寿州的职务,正如《文丛杂录》所载为“知州、光禄卿”。

林洙被杀,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称其为“故司农卿”,想必因疏于管理,也官降一级。好在有皇亲这层关系,嘉祐三年二月丁卯,宋仁宗任命“故司农卿林洙之孙”林洙为试将作监主簿,权为体恤。

林洙昔日的助手寿州通判王克臣,经降级处理,再升至“工部王侍郎”,在《文丛杂录》中讲述那场血案,历历在目。《宋仁宗实录》说林洙以驾部郎中的身份知筠州、抚州。《浙江通志》说林洙嘉祐三年

大美淮河 金广良 摄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“淮南历史文化撷英” (第六季) 大型征文

嘉祐二年(1057)六月六日天贶节的前夜,异常闷热。

淮河静卧在寿州城下,风平浪静。知州林洙因“少服菅鞋”,晚年躁热,露卧于州衙庭院纳凉,偏偏遭遇“月夜风高”般的惊心动魄。

“来人呀!快来!”林洙的呼叫急促,惊恐。

值守的衙役闻讯赶到时,林洙因受连续击打,头脸血肉模糊,仅剩一口气在。没多久,一命呜呼。

凶手被抓个现行,是个制造战鼓、号角的兵匠。深夜潜入州衙偷盗,被林洙发现,索性杀之。

知州在州衙被杀,寿州通判王克臣不得不报。这个案件被传得神乎其乎,甚至发生灵魂附体“指点迷津”,想必其中暗藏玄机。据宋代庞元英《文丛杂录》载,“工部王侍郎言,昔年通判寿州,知州、光禄卿林洙因鼓角匠人州衙为盗被伤而卒。后一日,其家女仆附语云,召筮判吕水部,既去。云某不幸且死,敢以事后事为托,某之死,非此兵之过,宣问有公案五道,要其照验。吕因问大卿附语使某何以信?乃曰:但看架上衣可知非妄。家人遽往视之,见一浅色汗衫,素未经着,血痕满襟。又曰:此非血,某之泪尔。家人以钱送